

如果说黄浦江是城市会客厅，那么苏州河则是魔都亭子间。上海中心城区的苏州河，从外白渡桥至外环线，蜿蜒曲折的背后是这座城市的百年往事，两岸的点点滴滴则是上海人的无限回忆。

黄金水道见证民族兴亡

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的研究，苏州河两岸的老地名，富有浓郁的乡村气息，有些是村落名，有些是河流名，有些是古桥名，有的还是当地的庙宇名。在上海开埠以前，这里占野分圃，散为村墟，家给人足，鸡犬相闻。

上海史学者郑祖安指出，开埠后的英美列强敏锐地发现，苏州河一带是贸易和水路航运的最佳港区 and 地域。

1899年英美租界大扩张后，处于苏州河北岸的闸北地区，东、南面为租界所夹，面临着西方列强继续侵及的严重威胁，上海、宝山两县的中国有识之士忧心忡忡，立即组织机构，在境内兴建桥梁、修筑道路、开辟商场，用加速地方繁荣的办法来抵制租界的向北、向西推进。

一时间，这里集聚了一批在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工商人物。

正如华东师大教授、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在《醉上海》一书中写道，苏州河畔，第一批中国实业家创办的工厂棋布两岸，在租界外商洋行的夹缝中，将农耕大国拽入工业文明，让“洋布”、“洋面粉”逐渐淡出中国百姓的日常。

“三湾一弄”的华丽转身

见证了上海城市发展与民族工业兴起的苏州河，同样也是这座城市苦难与重生的亲历者。

根据薛理勇的《潮起潮落苏州河》一书，现在普陀区境内的朱家湾、潭子湾和潘家湾，再加上小沙渡南岸的“药水弄”，合称“三湾一弄”，这里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棚户区、贫民窟。

上海的棚户区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。清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底，在黄浦江两岸各码头，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棚户。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在一些工业区附近的荒地、废墟、坟场上，包括苏州河两岸和其他河沟旁，相继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棚户区。

“三湾一弄”大致就是在那时形成的，当时的主要居民大多是



眼中的拖船和耳畔的汽笛陪伴了一代代上海人。摄影 / 陆元敏

附近的码头工人。

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涌入棚户区，尤其是从上海周边的江浙等地坐船而来的贫民，很多选择在“三湾一弄”登陆，在这片棚户区里安家立命。

作家许成章1937年出生在药水弄，后来又全家迁至朱家湾。在他根据回忆写就的《三湾一弄之朱家湾速写》中，提到最早的棚户区居民，清一色是外地人，有的因战乱而流离失所，有的因灾荒而背井离乡，更多的是因贫困而来上海谋生。

清晨，宁静的棚户区被一声“拎出来”吼叫声惊醒，门户洞开，每家拎出一只只马桶放至门前，随后劈引火材板，生煤球炉，霎时弄堂里烟雾弥漫，倒马桶车过后，烟雾中，“哗啦啦”刷马桶声响此起彼伏。那年代有首流行歌曲，开头两句：“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，多少人儿跟着它起。”倒是生活中的真实写照。

作家李其纲出生在“三湾一弄”附近的平江村，他对于棚户区的生活深有感触。经过他的观察，发现这里的人也分为三六九等——“上档次”的是民办小学的教师，中药房配药的药工，人力三轮车工会的干部，苏州河对岸的纱厂、面粉厂、啤酒厂、制鞋厂等大中型国营企业的工人。接下来是集体企业的工人，比国企工人差一些，算是二等；三轮车夫、拉橡皮塌车的车夫、码头搬运工、马路清洁工等卖苦力维生的，属于第三等；最底层的是那些没有单位、没有劳保、没有固定工资的人：街头擦皮鞋的、磨剪刀的、卖爆米花的、菜市场刮鱼鳞的……

值得一提的是，“三湾一弄”的棚户区，除少数为砖瓦平房外，大部分是草棚、简屋。另外还有极为出名的“滚地龙”——几根毛竹片弯成弓形，插入地里作架子，盖上芦席搭成棚，挂个草帘当作门，弯腰才能进出。没有窗，没有水电，没有下水道，到处是垃圾、臭水坑，瘟疫时常发生。